

经济特区的工业化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

□ 向晓梅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40年来，我国经济特区在“开放”和“创新”基因的哺育下，在发展优势的不断演进中，实现了对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较高的经济效率，从规模扩张逐步转向质量提升，不断推动工业化走向深入。在此进程中，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优势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重要转变。

经济特区的工业化实践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持续深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动态推进过程，其本质就是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只有成功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才能持续推进工业化走向深入。

在工业化早期，一个国家或地区主要依靠资源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产业发展处于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的低端。在工业化持续深化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将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以及专业技术等有效组合、形成合力，在创新生产应用中逐步形成竞争优势，并使其上升到全球创新网络重要节点位置，随后通过推动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迈向全球价值链和创新链的高端。

在过去40年中，经济特区立足于自身比较优势，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从产业链的最低端参与到国际分工中，不断聚集高端生产要素，动态持续培育竞争优势，从工业规模扩张逐步转向工业质量提升，成功实现了从比较优势转变到竞争优势的工业化深化过程。在此进程中，经济特区利用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等吸引要素跨国流动，有效发挥要素的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推动要素结构和质量的动态升级；充分利用腹

地资源优势，形成规模庞大的国内外大市场，为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构建由企业、产业、研发机构等构成的创新生态体系，打通了从创新到产业化的中间环节，形成纵向深度延伸与横向融合发展的完备产业链条，持续推动了产业升级；形成独有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为推进工业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动态培育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

40年来，经济特区紧跟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潮流，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适应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现实要求，动态培育竞争优势。

在工业化初期，经济特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利用要素成本优势切入国际产业链的制造环节，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在这一阶段，经济特区充分用好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同时发挥毗邻港澳的独特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形成了以对外加工贸易为特色的外向型经济产业结构。这个阶段是经济特区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投资软硬件环境得到改善，外向型工业经济初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经济开始起步，为后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工业化中期，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经济特区成功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实现了从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迅速赶超。经济特区依托仍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力以及资本积累，通过承接国际信息产业转移，引入资本、技术密度更高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加快推动产业升级。企业亦在这一过

程中提升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获取了动态比较优势。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迅速崛起，经济特区实现了经济内生增长以及发展上的赶超，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实现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

在工业化后期，经济特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吸引各种国际高端要素资源快速聚合，推动产业跃向全球创新链的高端，成功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特区不断推动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从依靠“三来一补”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由引进技术加工制造向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转变、技术创新由“跟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推动产业迈向产业价值链和全球创新链的高端。同时，经济特区不断加强金融与产业的融合与创新，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深化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城市从出口加工区朝着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发展。

经济特区推动工业化的基本经验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特区在推动工业化的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对外开放，实现高端优质要素聚集。经济特区充分利用开放的优势，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渐进有序的开放中吸引和整合全球资源，成功吸引了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集聚。同时，抢抓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电子信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电子工业，积极融入全球产

业体系。特别是顺应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趋势，不断吸引高端优质要素聚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空间载体，这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特区工业化的进程。

二是坚持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工业化构筑牢固的产业基础。经济特区在发展外源型经济的同时，积极拓展内源经济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实现了区域产业链的纵向深度延伸与横向融合发展，在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了全球独有的、完整且高效的制造业产业链。特别是民营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行业龙头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发展质量、创新能力、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在没有坚实产业基础的情况下，经济特区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主导战略，通过要素市场和投融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激发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在起初只有少量科技人员的“科技荒芜地带”，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产业创新体系，构建起由企业、产业、研发机构等构成的产业创新生态。

四是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建设全球标杆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特区的战略定位以及城市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济特区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转变。相应地，城市也从出口加工区发展成为工业城市，并逐步成为大都市圈核心城市，朝着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迈进。经济特区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发展，不断深化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广度，依托自身在区位、政策、产业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对接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吸引全球人才、资金、产业等优质要素资源集聚，在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与此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四是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市场体系优不优、效率不高，市场主体的感受最为真切。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进程中，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的需要，既要在战略上布好局，也要在关键处落好子，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聚焦重点问题，积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了解企业家所思所想、所困所惑，涉企政策制定也要多听企业家意见和建议，以此推动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必须看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经济特区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定海神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深走实。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谋划建设思路、制定建设方案、推进建设实施等各环节，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制约，整合创新资源，实现人尽其用、物尽其用、共建共享，在率先形成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还要用好长三角地区的比较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度高，市场规模大，各类新技术新模式应用场景丰富，各地发展数字经济各具特色，企业集群效应明显，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在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及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方面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人才、金融等资源丰富。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人才资源丰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情况良好，不断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积累经验。这些都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肖伟）

新型城镇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机结合点，对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有巨大促进作用。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刘晓萍

城镇化是最大的 内需潜力所在

新型城镇化既是有效投资的“加速器”，也是居民消费的“倍增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城市品质，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居民消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需求的潜力。

新型城镇化能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将释放巨大需求潜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2.1倍，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基础消费领域消费年人均差距约7650元，在教育文化娱乐及耐用品等领域消费年人均差距为6338元，在旅游休闲、信息服务、知识付费等新型消费领域的消费差距将更加明显。城镇人口的扩大，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新型城镇化能有力拉动有效投资。新型城镇化是以提升质量为导向的城镇化，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完善城市功能可激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在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养老托育设施、公共文化设施、生态环境设施等软硬件设施方面，城市发展尚有许多短板弱项要加快补齐补强。补齐这些短板，既有利于更好满足城市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也有利于充分释放投资需求潜力。比如，城市更新改造就蕴藏着巨大投资潜力，特别是城镇老旧小区大量面广，对此进行改造提升将进一步释放投资需求。住建部数据显示，去年各地上报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达17万个，涉及居民上亿人。还要看到，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县城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对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在县城就业安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有效投资和消费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方兴未艾，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同样值得关注。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激发城镇化的内需潜力

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方向，联动推进人口、土地、投融资等相关领域的改革，是充分激活新型城镇化巨大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在这方面，关键是不断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投融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持续释放消费需求，全面拓展投资空间。

需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及相关配套政策不断出台，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框架日益系统完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不少地方在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要统筹户籍制度改革与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和政策体系；完善居住证制度及其配套机制，可考虑放宽居住证申领条件，健全居住证持有人与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利益引导机制，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全面落实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确保城市新老居民同城同待遇；等等。与此同时，还需更好落实国家和地方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政策。

需不断完善城市投融资体制机制。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量大、期限长，仅靠地方财力难以支撑，但规范透明、多元化和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却尚未健全。主要表现为：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力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在城市建设运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欠缺科学界定；尚未形成融资能力强、良性循环的投融资体系，城镇存量资产难以盘活；尚未建立资本金补充现金流平衡的完善机制，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结构尚不合理；等等。对此，需进一步拓宽市场化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推进合作项目运作规范化制度化，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积极盘活城市存量资产、盘活增量资产、激活无形资产，探索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项目转让给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等方式购买基础设施资产，实现“投入—经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创新市政项目建设运营模式，统筹整合地方财政、土地、金融和相关政策等各类资源，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有机组合，建立健全项目综合收益平衡机制，提升社会资本向公益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严格防范和积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以新型城镇化 激发内需潜力

以高标准市场体系助力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

□ 高洪波

40年前，我们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经济特区亦要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正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尚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经济特区要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实践中，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并将其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应该看到，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更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更好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有利于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有利于切实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也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最为活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前沿的地区，经济特区率先开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以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经济特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具体来看，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一是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要优化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保护企业家

合法权益，使企业家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更好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支持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合作和竞争，切实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税负负担、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

二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经济特区要不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是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发力。经济特区大多毗邻国际市场、背靠国内市场，长期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新形势下，经济特区要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

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充裕以及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沿海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需要破解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协同推进。

这是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平衡发展的必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宏春 提出：

长三角地区发展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前，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地区需肩负起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的重任，发挥重要的窗口和示范作用，做好新发展格局的探索者。

长三角地区实现更好发展，关键是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这是打破行政壁